“研究军事、研究战争、研究打仗”专论

在辩证分析中提升战略评估能力

■战平生

引言

习主席强调：“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，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，提高驾驭复杂局面、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。”当前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战争形态深刻演变，军事系统跨域联动、多要素耦合等特征越来越显著。面对错综复杂的战略形势和大量涌现的不确定因素，战略评估作为处理复杂军事系统问题的抓手，重要性愈加凸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必须更好地运用辩证思维，在辩证分析中透视矛盾本质、校准研判标尺，从而不断提升战略评估的科学性、前瞻性与指导性，为制胜打赢提供坚强支撑。

把握好军事与政治的辩证统一

克劳塞维茨在《战争论》中讲：“战争是政治的延续。”把握好军事与政治的辩证统一，既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要求，也是认识战争本质、开展战略评估的重要遵循。二者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，军事与政治相互联系、相互制约，政治规定军事行动的性质、方向和边界，军事行动作用于政治目的的实现。只有把军事与政治、战略与政略统一起来思考，才能确保战略评估始终站在政治高度看问题，进而防止评估方向脱离政治要求、评估结论偏离战略全局。

在实践层面，战略评估要坚持以政治目标为纲，回答好军事行动“该不该进行、进行到何种程度”的问题。综合研判军事行动的政治方向、边界和效应，准确把握军事手段运用的尺度，前瞻预判军事行动可能引发的国内外连锁反应，科学评估不同军事行动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、战略影响和全局影响，从而保证军事行动的正确性、合理性。要坚持以战略效果为要，立足全局审视军事行动带来的效果。着眼于战略全局的长远性、稳定性、根本性要求，以能否积极塑造战略主动、能否有效保障政治目标实现作为评估军事行动质效的重要标尺，防止局部利益、短期目标干扰战略全局。要坚持以动态校验为尺，把战略评估贯穿战前筹划、战中调控、战后复盘全过程。在动态中检视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的适配性，根据情况变化持续进行方案调整与策略纠偏，确保军事行动始终在政治框架内有序展开。

把握好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

辩证法告诉我们，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，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。开展战略评估，必须准确把握二者辩证关系，防止主次颠倒、相互割裂。对于军事领域而言，国家战争能力的强弱与战争潜力的大小，主要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制度体制、经济水平、人才素养、工业体系等内在要素，这些内在因素共同作用于综合国力，始终居于主导地位。在战争对抗中，复杂的外部环境对这些内在因素的影响会显著增加，既可能创造有利条件、释放内在潜力，也可能放大短板、衍生风险。因此，战略评估要把握好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，防止以显性指标替代深层分析、以环境判断“冲淡”内生能力考察。

一方面，在评估内因时要跳出兵力多寡、武器优劣、物资盈缺等表层性指标的局限，将战略意志、组织能力、科技发展等深层因素纳入评估范围，坚持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相统一，坚持战略、战役、战术一体贯通审视，把握能力建设内在逻辑，找准体系建设发力重点。另一方面，在评估外因时要跳出“环境扫描”的浅层化倾向，要科学区分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、主要条件与次要条件、长效条件与短效条件，既看对手优势，也看其弱点；既看外部支援的可能，也看自主可控的程度，使外部条件的变化始终处于可察、可控、可利用之中。

把握好历史与未来的辩证统一

战略评估本质上是在历史与未来的时间链条中，对战略进行检验、辨析和校正的认知活动，其核心在于以贯通历史、现实与未来的大视野审视战略演进，进而看清大势、赢得主动。历史蕴含规律性镜鉴，现实提供对策性基点，未来标示预见性方向，三者相互映照、循环校验，构成战略认知的有机整体。这就决定了，战略评估不是对过往的简单复盘，也不是对未来的孤立猜想，而是面向实践的战略校验。只有坚持辩证思维和历史眼光，从历史规律中把握发展趋势，从现实矛盾中辨明问题症结，从未来变量中预判风险挑战，才能形成立体动态的战略判断，进而持续释放战略评估效能。

要洞察历史规律性。中国古代虽无“战略评估”之名，却有丰富的战略评估思想，我们可以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兵学智慧的时代价值，不断提高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，准确把握事物发展趋势。要增强现实对策性。紧盯战略实践中的难点痛点，以贯通古今、以史察今的大历史观，把历史镜鉴转化为态势研判、风险预判的评估能力，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把握，增强对现实问题的透视力，提高对策的针对性、实效性。要提升未来预见性。统筹把握战略评估中的变与不变，积极构建多种未来冲突场景，辨析不同变量触发下的矛盾演化路径，识别强弱转化的关键节点和潜在风险，敏锐捕捉颠覆性技术引发的战争形态突变与作战样式革新，以前瞻创见支撑谋战胜战。

把握好全局与重点的辩证统一

战略评估的要点，在于从全局矛盾中甄别主要矛盾，从主要矛盾中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，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全局与重点相互依存、动态转化，主要矛盾决定体系运行方向，矛盾的主要方面影响问题性质与态势走向。只有坚持系统观照、动态审视，把握矛盾运动的阶段特征和传导规律，防止把全局与重点割裂、把静态结论套用于动态态势，才能透过复杂现象抓住本质，以战略评估的重点突破牵引全局水平跃升。

首先，要立足全局辨识重点。围绕总体战略目标衡量各类问题对全局的影响权重，筛选牵动体系稳定、决定博弈走向的核心矛盾，聚焦关键领域，防止泛泛而评、问题失焦。其次，要动态把握重点转换。主要矛盾随对抗进程、技术条件和任务阶段而演变，这就决定了战略评估不是一劳永逸的。因此，必须建立滚动评估、跟踪研判机制，及时捕捉矛盾转化信号，科学预判旧重点让位、新重点生成的临界条件，围绕新域新质战斗力生成、体系支撑极限、电磁与网络攻防等关键变量调整评估重心，使评估结论始终与态势演进同频共振，防止以阶段结论替代全程判断。再次，要坚持以重点观照体系、服务全局。把制约体系效能释放的关键问题作为洞观体系的窗口，深入剖析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、链路结构和传导关系，廓清体系全貌，透过矛盾运动把握全局态势演化规律。

把握好谋略与技术的辩证统一

谋略与技术的辩证统一，是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战略评估必须把握的基本关系。战略方向限定着技术应用方向与伦理边界，技术发展拓展战略认知边界与行动能力，二者相互塑造、协同演进。在智能时代，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显著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，但技术本身难以自主完成价值取舍，一旦脱离战略层面的政治考量与人道约束，便可能引发伦理争议、法律风险乃至战略反噬。技术优势只有嵌入战略运筹、接受谋略导引，才能转化为体系效能和对抗优势。因此，必须坚持谋略引领技术、技术支撑谋略，使技术运用始终服从战略目标、体现战略意志。

战略评估应立足全局明晰目标导向和约束条件，突出技术应用的军事红线与道德边界，让智能手段服务于战略判断而非替代战略决断。具体而言，要以人机协同重塑评估方式：在确保智能向善、算法可控的前提下，运用综合集成方法推动理论研究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，构建人在回路的高可信度评估体系。一方面，可以依托海量数据关联分析和多方案快速比选，弥补人脑算力局限，提升评估科学性与精准度；另一方面，可以发挥专家战略直觉和经验优势，对算法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终审决断，识别隐性风险和潜在后果，形成技术赋能与人类智慧相辅相成的评估格局。

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

开展战略评估，必须有守正创新的底气和锐气。当前，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演进，一旦丢掉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，片面追求打破常规、求新求变，就容易脱离实际、偏离战略目标，甚至陷入不知“为何而评”的迷茫。这要求我们在战略评估中必须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和方法研判战略问题，不囿于一时得失、不惑于技术表象，切实守住思想之正、方向之正、方法之正，确保评估结论经得起历史、实践和人民检验。同时，必须清醒认识到，守正并非守旧，唯有在深刻理解既有理念的基础上勇于创新，才能使战略评估更好适应科技之变、战争之变、对手之变。

实践中，一方面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立足新质战斗力生成和新型安全领域拓展，主动推动理论创新、方法出新。积极评估太空、极地、深海等新兴领域的现实问题，探索契合新兴领域的评估方法，实现评估思想深度、战略高度与技术新度的有机统一。另一方面要厚实战略评估之基，大力培育创新文化，涵养求真、审慎、务实品格，为战略评估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，在守正中创新、在创新中守正，确保战略评估始终服务战略决策、支撑制胜打赢。

群策集

让训练数据“颗粒归仓”

■王子银

秋收时节，稻谷金黄、颗粒饱满，农人抢抓农时、精收细打，确保每一粒粮食都归仓入库。粮食，能够为人体提供必要养分，而在军事领域，数据则是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确保战斗力生成的“原材料”之一。训练数据采集是否全面、存储是否规范、运用是否高效，直接关乎实战化训练成果向实际战斗力转化的质效。因此，进行训练数据采集与存储，同样需要有“颗粒归仓”的紧迫感和精细度，最大程度发挥训练数据的作用。

在归仓范围上做到“应收尽收”。训练数据是反映部队真实能力状态的“原生画像”，每一次演训活动、每一个课目考核、每一组装备运行参数，都在生成大量反映战斗力底数的信息，如果不注意有效采集这些信息，就如同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，同时，数据的价值具有累积性，孤立的、不连续的采集对于反映部队整体面貌效果有限。这就决定了，进行训练数据采集，既要看到其重要性，也要聚焦其联通性、整体性，对各类数据必须做到“应收尽收”。首先，要建立覆盖各专业岗位、各训练环节的数据采集标准体系，明确什么数据必须采、由谁采、何时采、怎么采，把采集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。其次，要区分作战、训练、装备、保障等不同领域，分类设计采集表单和记录规范，确保一线官兵在训练现场能够便捷、准确地完成数据记录。再次，要注重采集的时效性，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训练过程数据的实时抓取和自动留存，减少人工转录带来的遗漏和误差，真正让数据采集从“随手记”变为“规范录”。

在管理规范上做到“分类入仓”。数据归仓不是简单的物理堆积，而是一个需要科学分类、有序存放的系统工程。粮食入仓要区分品种、等级和用途，训练数据同样需要按照性质、来源和时效进行分类管理。未经整理的数据如同混杂着秕糠的谷粒，看似数量可观，实则难以直接使用，只有经过甄别筛选、统一标准、分类存储，才能在需要时快速调取数据、精准匹配需求，使得训练数据物尽其用。做到训练数据的“分类入仓”，关键要构建结构合理、层次清晰的训练数据库体系。一方面要按照统一的数据格式和编码规则进行标准化入库，消除不同来源数据之间的“语言障碍”，确保各类数据可比对、可融合、可相互校验。另一方面要建立数据的定期审核和更新机制，对陈旧失效的数据及时清理或进行标注，对新增采集的数据及时校验入库，从而保持数据库的“新鲜度”和可信度。同时，要明确各层级在数据管理中的职责权限，做到层层有人“把关”，层层有人“值守”，防止训练数据管理陷入各自为政的“真空地带”。

在激活动能上做到“用仓如流”。收集训练数据的最终目的在于运用，做好存储不是训练数据的“归宿”，而是更好发挥其价值的起点。尤其是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，数据运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可以说，善用数据者得先机，不善用数据者失优势。只有推动数据深度嵌入训练计划制订、演训方案设计、装备效能评估等具体环节，才能促进数据由“原材料”向“成品”转化，实现从资源积累到战斗力生成的价值跃升。做到“用仓如流”，需要打通数据供给与数据需求之间的通道，推动数据资源向训练一线下沉、向实战需求聚焦。一方面，要依托训练数据平台和数据仓库，建立便捷高效的数据查询、调用和推送机制，优化数据调用流程、降低使用门槛，使基层官兵在组织训练时能够快速获取所需历史数据、参考指标和典型参数，避免“有数据不会用、想用数据找不到”等不良情况。另一方面，要推动数据在各层级、各专业之间共享互通，打破“信息孤岛”和部门壁垒，实现跨部门、跨领域的比对印证与综合分析，注重将数据分析结果及时反馈到训练实践中，形成“采集—存储—分析—运用—再采集”的闭环链路，使每一轮训练都能在前一阶段数据积累的基础上精准发力、迭代改进，让数据真正成为驱动战斗力提升的有力引擎。

正确应对“战场陌生感”

■陈祥鹏

挑灯看剑

所谓“战场陌生感”，就是战争形态不断演进在作战人员认识层面的客观反映。具体而言，战争形态进入信息化、智能化以来，战场空间多元延伸，新兴作战领域不断涌现，战场边界、力量构成、对抗规则等随之发生区别于传统战争的深刻变化，“战场陌生感”由此产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能用昨天的“地图”指引今天的战场，而是要以全域视野界定陌生边界、以问题牵引打通陌生领域、以体系能力适应陌生战场，进而把陌生空间、陌生领域转化为可认识、可设计、可有效准备的作战空间。

以全域视野界定陌生边界。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，战场已不是某一固定空间的单向延伸，而是陆海空天网电等多维空间构成的复杂体系，这使得作战维度日趋多元，任何维度的短板弱项都可能造成作战视野的狭窄、作战设计的失真。因此，必须建立全域“扫描”的维度清单，系统辨识可能影响作战的空间、要素、规则和限制，把陌生领域作为作战设计的前置变量。要坚持整体思维，统筹多域力量、多种手段和多个阶段。同时，要着眼战争形态演变规律设计作战概念，对新兴领域的作用机理、运用边界和协同方式作出前瞻描述，将陌生空间置于作战筹划、方案设计和训练准备之中，进而做到提前认识、提前做好准备。

以问题牵引打通陌生领域。新兴作战领域之所以给人以“陌生感”，原因就在于相关知识结构不全、数据条件不足、实践验证不够等。而新兴领域之间又存在强关联性，具有跨学科、跨军地、跨技术门类等特征，想要将其全部研究透彻，难度极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的放矢的“问题牵引”就成为在庞大“战争迷雾”中廓清方向、消除“陌生感”的有效抓手。可以围绕未来打什么仗、在哪些空间展开、依靠什么支撑等基本问题，把陌生领域分解为可研究、可验证的具体课题，把分散的知识、数据和手段统合起来，通过找准问题打开未知领域，力求将“战场陌生感”转化为新的创新方向。

以体系能力适应陌生战场。陌生战场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能力都难以独立发挥作用，必须依靠体系能力的整体跃升，尽可能地消除“战场陌生感”。在实践层面，要着眼多域联动、跨域协同，把信息、远火、特战、无人等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有机融入作战体系，构建全域覆盖、弹性可重构的力量结构，使各域力量在陌生环境中能够快速聚合、精准释能。要强化实战化训练，敢于在陌生地域、复杂电磁环境和极限条件下“摔打”部队，通过大胆试错获取装备和战法的真实数据，把训练场上的“陌生”转化为战场上的“熟悉”，力求以体系之“全”应对战场之“变”，从而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。

透视智能化作战指挥的不确定性

■廖振熙 邹振宁

谈兵论道

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，作战指挥在感知广度、计算速度与行动精度上的显著提升，极大提高了战场“透明度”。然而，技术赋能并未将不确定性“逐出”指挥领域，反而使其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嵌入到指挥链条的每一个环节。这些不确定性与指挥主体的认知结构、指挥对象的自主行为、指挥工具的算法逻辑以及指挥环境的演化节律深度纠缠。研究、梳理智能化作战指挥中的不确定性，对于有效驾驭战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，提升智能化作战指挥决策质效至关重要。

指挥主体：人机协同的认知鸿沟。智能化指挥主体不再是纯粹的“人类”，也不是完全自主的“机器”，而是由指挥员与智能系统共同构成的混合体。这一混合体的运行前提，是人类指挥与机器智能在认知逻辑上的差异能够被有效弥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类的判断依赖经验积累、直觉洞察与价值权衡，能够在信息残缺、规则冲突的情境中作出富有弹性的决断；机器的“认知”则建立在样本训练、特征匹配与概率推演之上，擅长在既定框架内寻求最优解，却难以理解框架之外的意外与模糊。两者之间的认知差异，可能会带来诸多问题。比如，指挥员若过度依赖机器输出的“清晰”结论，就可能逐渐丧失对战场异动信号的敏感；机器若无法准确捕捉指挥员的决策风格，其推送的方案便可能偏离实际需要。最大程度上消除这些差异，关键在于建立“人智为体、机智为用”的协同秩序。一方面，应在指挥流程中明确人机各自的权责边界，将机器的作用定位于态势梳理、方案预生成与推演验证，而将意图确立、价值判断与临机决断保留在人的手中。另一方面，应推动算法逻辑的可解释化与人机交互的深度化，使指挥员能够理解机器结论的生成路径与置信边界，也使机器能够持续吸收指挥员的经验反馈与决策偏好，在双向调适中形成真正的决策互补。

指挥对象：自主行动的涌现扰动。智能化作战指挥的对象，正从被动接收指令的作战单元，转变为具备一定自主感知、自主规划与自主协同能力的智能体集群。指挥员下达的不再是逐条逐项的刚性指令，而是更接近于任务意图与行动边界的设定。这一转变提升了指挥效率与行动灵活性，却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：当众多自主单元在局部信息驱动下各自作出“合理”决策时，其交互叠加所产生的整体行为，却有可能并不符合整体作战意图。在这一不确定性的影响下，作战行动可能表现为集群协同效率的突然跃升，也可能表现为行动节奏的意外紊乱、任务重心的自发偏移，甚至出现与指挥意图相悖的集体趋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指挥员面对的是一个具有某种“自适应性格”的复杂系统，这对指挥决策的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对此，指挥控制的重心应从“指令包办”转向“规则引导”。在任务赋予阶段，须精心设计自主单元的决策规则、协同协议与行为边界，使局部自主在总体上服务于全局意图。在行动过程中，应建立意图回传与行为监测机制，使指挥员能够及时感知集群行为的异常偏移，并通过调整规则参数或注入约束条件实施柔性干预，避免不确定性“尾大不掉”后再进行补救。同时，应通过充分的仿真推演与渐进式授权，逐步摸清智能体集群在不同条件下的行为倾向，不断提高指挥决策的科学性、预见性。

指挥工具：智能跃升的伴生风险。智能化指挥工具以算法为核心、以数据为燃料、以网络为骨架，其对指挥效能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。但工具越智能，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、要素之间的耦合度以及对外部条件的依赖度也同步攀升，伴生风险由此滋生。比如，算法黑箱使指挥员难以完全洞悉结论的生成机理，数据偏差可能在无声中扭曲态势认知，模型脆弱性在面对未预期情境时可能暴露无遗，网络依赖性则使指挥链条在遭受干扰或断链时面临效能骤降的风险。而且这些风险并非孤立存在，它们可能沿着指挥链条逐级传导、交互放大，甚至在关键时刻以“系统失灵”或“输出失真”的形式集中呈现。因此，规避智能化指挥工具中暗藏的伴生风险，是提高智能化指挥质效的必要环节。在实践层面，须在追求先进性与保持可控性之间求得平衡。应推进算法的透明化与可验证化，对关键模型进行系统性的偏差检测与边界测试，确保其输出在可理解的范围内。应构建冗余备份与降级运行机制，使指挥体系在智能工具部分失效时仍能维持基本运转，避免“一损俱损”的链式崩塌。还应保持必要的人工复核节点，对机器生成的关键结论实施抽检与校验，防止工具逻辑替代指挥逻辑。

指挥环境：自适应演化的内生变数。智能化作战的指挥环境，是由敌我双方智能系统共同参与塑造的动态复杂场域。双方的数据投放、算法博弈与自主行动相互激发，使环境本身具备了自适应演化的特征：一方的策略调整会引发另一方的连锁反应，战场环境的“面貌”在对抗中持续刷新，昨日有效的行动逻辑可能在今日失效。这种演化不是可预先穷举的变量集合，而是内生于对抗过程之中的持续生成，指挥员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因而具有了“自我繁殖”的能力——每一次试图消除不确定性的行动，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催生新的不确定维度。面对自适应演化的环境，指挥体系须以弹性与开放性应对。可以建立滚动感知与快速修正机制，缩短从环境变化到指挥调整的响应周期，使指挥决策跟上环境演化的节律。还可以保持指挥架构的可重构性，允许根据对抗态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力量编组、信息流向与决策权限，避免刚性结构在环境突变时陷入运转失灵。同时，需要在指挥观念上树立“以变制变”的自觉，将环境演化视为对抗的常态而非例外，在持续适应中把握主动、赢得先机。